

怀念集

HUAI NIAN JI • HUAI NIAN JI

王首道



怀 念 集

王 首 道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怀 念 集

王 首 道

责任编辑：陈 敬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68,000 印张：5.125 印数：1—8,300

统一书号：11109·220 定价：0.71元

前 言

我跟随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漫长的斗争生涯，使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的确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党，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革命战士是铁打铜铸的硬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翻阅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你就会明白：为解救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统一贫脊破碎的旧山河，多少英雄豪杰的努力都半途而废了。然而，这一切，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斗争，都变成了现实。斗争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诞生了新中国。

在六十多年的革命长途中，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战士，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曾给予我指导和关怀，战友曾给我帮助和友谊……为了永志不忘，我汇集了部分回忆文章，编成这本《怀念集》。我愿让后人透过这字里行间，了解过去革命斗争的点滴情况，以帮助大家认识在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深远意义。如能进一步激发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

积极性，我就感到心安和满足了。

我要把这本《怀念集》，献给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日。

王首道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目 录

前 言

革命的摇篮

——回忆毛主席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1

殷勤的培养 热情的关怀

——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坚持无产阶级干

部路线的革命实践 23

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毛主席对我的教导 43

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 54

怀念周恩来同志 59

追念刘少奇同志 68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

——回忆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

战士任弼时同志 87

卓越的军事家徐海东 94

白首壮心松柏操

——怀念伟大的革命战士林伯渠同志 106

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战士陈郁	128
一生扎根人民中	
——怀念周立波同志	134
出淤泥而不染	
——怀念李六如同志	142

革命的摇篮

——回忆毛主席在广州主办 农民运动讲习所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已经离开我们了。我回想起毛主席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重温毛主席当年的谆谆教导，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心情特别激动，使我更加怀念他。

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一九二六年春，我和许多同志来到农讲所学习，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导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开始懂得了社会上存在着阶级、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被压迫阶级要起来革命的道理。在这里，我们许多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火红的党旗下，我们庄严地向党宣誓：

“服从纪律，牺牲个人；

努力革命，阶级斗争；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每当我回忆起在农讲所接受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诲和殷勤培养，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当年的情景又展现在我的

眼前。

一、革命的摇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是中国历史发展新时代的开辟者。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党诞生以后，领导了全国的工农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在大力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一贯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早在一九一七年，毛泽东同志在青年学生时代，就深入长沙、宁乡等五县农村进行调查。一九二一年初夏，又深入岳阳、华容、安乡、常德、湘阴等县农村调查。一九二二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亲自讲授《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具体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广大农民必须团结起来，从“土财主”手中夺回土地才有出路。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同志派遣水口山矿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回到他们家乡衡山的岳北一带开展农民运动，于同年九月建立了岳北农工会，会员达四万多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我们党的三大决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这次大会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为适应工农运动迅速发展的需要，从一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二五年底，我党在广州先后举办了一至五届

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是训练广东等地的农民运动干部，有四百多人经过训练后被派到农村去做农民运动工作。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中共湖南省委选派了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等五十多人到广州第四、第五届农讲所学习。

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一九二五年春天，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的阶级状况，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在毛泽东同志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韶山地区二十多个乡很快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夫人杨开慧同志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工作，在农民夜校给农民讲课，努力从事农民运动。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已遍及湖南、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河北等十多个省、区，仅广东就有六十一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到六十多万人。湖南省有四十四区建立了农民协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等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祖涵（即林伯渠）、萧楚女等九人为委员。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讲所的消息，象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也传到了湖南。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当时，我们一

些参加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在城里开办平民夜校，到乡间演文明戏，化装讲演，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那时，我们进步青年多么渴望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学到更多的革命道理，进行更多的革命工作啊！一九二六年三月，湖南党组织秘密通知我和其他三十五位进步青年到广州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讲所学习。我内心无比激动，怀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从长沙经武汉、上海前往广州。经过长途跋涉，几经转折，终于来到了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讲所，来到了培养干部的革命摇篮。

这届农讲所，招收学员三百二十七人，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他们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按照农讲所学员的条件，他们必须是决心从事农民运动，富于勇敢奋斗精神，身体强健无疾病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三月各地学员陆续到校，四月举行了入学考试，五月三日正式开学。我们学习的课程共有二十五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也包括了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许多教员都是由我党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兼任。同年九月毕业后，学员们秘密回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二、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同志为反对当时党内以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表了《中国社会

各阶级的分析》，在农讲所亲自向我们作了专题讲授。毛泽东同志在这篇光辉文献里首先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相互关系及对革命的态度，正确地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高举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

我还深深地记得，毛泽东同志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采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学员听后，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例如他在讲到地主的产生时指出：地主的土地和钱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命里注定就有的，是从佃户、雇农身上剥削来的。他具体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地主土地的来源，大体上有：前清的官僚和现在的政客、军阀，以其刮地皮所得之金钱购买土地，成为大地主；劣绅、匪首等，用霸占、抢夺得金钱和土地；族长、会首、教长等利用祠堂、庙宇及各种地方公会以祀祖祀神等方法集资购买土地；城市及乡村商人与其他自由职业者积资购买土地；等等。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泽东同志用很多生动的事例，说明中国农民（中农、贫农和雇农）受的剥削最多，受的压迫最厉害。

他说，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花样很多，而且非常严重：一是倾销商品，近五十多年来（1870年—1925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年都是大量入超，致使我国大量的白银外流，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经济的破产；二是帝国主义从中国农村廉价收购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三是中国反动政府借的大量外债及其利息，主要是农民负担的；四是战争赔款，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也是落在农民身上。

讲到军阀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就有：田赋、附加税、临时捐、军事特捐、厘金、盐税、正杂税等，直接的、间接的剥削，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

至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除了重租（农民要把租种地主土地所得的收入的40—70%交给地主）、重息（借地主和高利贷的钱粮，年息一般为36—100%）、重捐（如田亩捐、丁捐、猪牛捐、民团费……）等经济剥削外，还有各种超经济的剥削，如敲诈勒索，贪污舞弊，无偿劳役，强迫送礼，以至公然抢掠

.....

毛泽东同志通过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向我们指出：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这就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

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同志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之后，作出科学的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同志谆谆教导我们，只有“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受他所属的阶级所支配，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这对我们进行长期革命斗争是一门基本功。

毛泽东同志这篇光辉著作，指引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科学论断，是指导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光辉指南。

三、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在农讲所，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发动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但是，对这个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当时在党内许多人中没有得到正确解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味迁就资产阶级，只注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感到工人阶级力量单薄，但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取得最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的课程中，深刻分析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时，毛泽东同志反复教导我们：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占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但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不肯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工作，在党内存在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为了帮助我们加深认识，毛泽东同志就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来说明农民的作用。他说，中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不和反封建结合，则帝国主义是反不掉的。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他说，革命是要联合大多数人才能取得成功的，农民约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一定不能抛掉农民这一支大军。他还着重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东西，是农民生产出来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生产的主力军——农民的参加，就不能成功。他批评了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农民无知识，又不集中”，怀疑农民的革命力量的错误看法。他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之竭力拥护，是不能成功的。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帮助革命军队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消灭陈炯明……都出了很大的力。还有我国历史上的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这些革命斗争，都是在农民还没有得到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时，就表现出这样伟大的力量。如果有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在反复阐明上述基本看法之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从革命的目的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而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地主的封建制度，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总之，假如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这是多么深刻，多么透彻的分析啊！

我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在讲授《农村教育》这门课程时的一段既通俗又深刻的话。他在讲了农村存在地主豪绅和劳苦农民两大对抗阶级后，接着说，孔孟之道说什么“士农工商，以士为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上品人”很少，“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是闲人，有钱人，是压迫、剥削阶级；“下品人”占农村大多数，是穷人，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下品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遭受压迫剥削，起来造反，却又屡遭失败。现在，我们要进行农村教育，就是教育“下品人”，要发动广大的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的精辟论述和科学分析，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做过农运的青年人，思想豁然开朗，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

今天，当我回忆毛泽东同志在农讲所讲授农民问题的情景，感到分外亲切，十分深刻。后来，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四个时期我们党做农民工作的经验，指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领导我把工作重心转到广大农村去，依靠